

Z 4713

沈阳文史资料

第十三辑

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7·3

目 录

东北大学在西安·····	李正风 (1)
法库县委在陶铸关怀下的三年·····	于 之 (7)
攻克昌图战斗纪实·····	张竭诚 (17)
回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郑洪轩 (25)
东北讲武堂第十期概况·····	于维洲 (37)
浴血奋战 为国干城·····	周 毅 张秀春 (41)
从四川资阳到辽宁沈阳·····	李国俊 (70)
“五卅”运动在沈阳·····	郎俊章 (93)
近百年沈阳故宫历劫举要·····	李凤民 (96)
“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补赘·····	李凤民 (108)
沈阳报刊史话·····	陈 言 (119)
日本商人入侵奉天始末·····	王 忞 (140)
奉天省银行业概况·····	刘世荣 (153)
汇华银号的兴衰·····	张其先 (170)
话说天益堂药店·····	张志民 孙立品 (179)
沈阳饮食业一瞥·····	杜宏博 (188)
八王寺汽水厂今昔·····	乔国祥 吕纪芬 (196)
奉天第一商场从创建到中兴·····	白奉贤 (201)
怀念祖父颐园老人·····	王漪云 (203)
奉天外籍传教士一瞥·····	齐守成 (208)
伪满劳工协会内幕及其罪行·····	袁铁凤 (220)
冯德麟其人其事·····	魏福祥 (227)

东北大学在西安

李 正 风

编者按：此文系李正风同志应陕西团省委青运史研究室之约，为纪念“一·二九”五十周年而作。

一九三六年初，东北大学工学院从北平迁到西安。在西安城南建校，条件很差。东大迁校，当时有各种想法，保守学生以为从此可以退出北平学运旋涡；进步学生感到西安政治形势好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张学良将军（兼东大校长）则意欲引进一些进步力量，作为群众基础。

清明节，西安各校学生到茂陵为黄帝陵扫墓，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从中挑拨，为一点小事，东大学生和西安学生出现一些裂痕，很不利于西安学生团结救亡运动。

暑期，北平学联、民先全国总队部派傲北风等三人来西安联系，传达全国学运形势，研究西安学运状况和东大工学院内部情况。院长金锡如比较开明，态度明朗，大力支持学生运动。我们于九月间，首先在东大成立民先队。队长刘金声，成员有李正风、伊文家、刘鹏、胡景和、安晓天等。我们分析了西安学运形势，西安学生迫切需要有一个学运统一组织。首先必须消除西安学生与东大学生的裂痕。决定由刘金声负责筹组西安民先队部，在地方党的领导和支持下，进展很顺利。首先和李运璧、华于仁、朱萍、何贵生等建立了联系。先后到西安高中、西安师范、西安二中等校发展队员。十月份，民先西安队部成立，推举刘金声任队长。大家志同道合，从此，为西安

学生东大学生团结一致共同战斗奠定了政治基础。

不久，在民先广泛活动的基础上，筹备成立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民先队部责成我筹组。我首先在班内发起成立班救国会，随后串联各班，成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学生救国会，推选我为东北大学学生会主席。然后我通过民先和各校建立联系，进展很顺利，条件已经成熟，最后由东大、西安高中、西安师范、西安二中等校发起，成立了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各校均为团体会员。推选西安高中李连璧为学联主席。我代表东大负责总务部。不久，促成了西安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西安学联作为团体会员参加。从此西安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以统一战线的形式走上了政治舞台。

学联成立后第一个行动是十一月七日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鲁迅先生追悼会。虽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拦刁难，宪兵砸了主席台，但我们不畏强暴，在主席台下用喇叭筒子讲话，慷慨陈词，群情激昂，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嘴脸，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是我们第一次检阅西安学生团结战斗的力量，在政治、思想、组织上为今后行动作了充分准备。

第二个行动是西安学联组织赴绥慰问团，携带慰劳品，到绥远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我校胡景和、宋平山等参加，慰问团受到了傅作义将军的接见。并以西安学联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扩大宣传，鼓舞士气，充分显示西安学生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决心。

第三个行动是发起“一·二九”周年纪念进行大规模请愿活动。当时国民党大批部队已进抵潼关，蒋介石驻在临潼督战，准备打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企图围剿陕北红军。战云密布，一触即发。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侵略华北，绥远抗战前线孤军无援，只得浴血苦战。在此大敌当前之际，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一意孤行，继续高唱“攘外必先安内”的滥调，激起西北广大人民、东北官兵的强烈愤慨。千钧一发，形势逼人，西

安学联在党的领导下，提出隆重纪念“一·二九”周年，立即受到西安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热烈响应。

十二月九日清晨，各校学生（包括小学高年级学生）和各界代表纷纷到书院门集合，大约有万余人参加。我们吸收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经验，召开了市民大会，高唱革命歌曲，明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行使民主，释放上海爱国七君子，全国动员援绥抗战”等进步口号。大会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举行了示威游行。首先到张学良的“剿匪总部”请愿，由一个处长接见，态度很不明确，含含糊糊不敢明确表态。接着到陕西省政府请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拒不接见，紧闭大门。经过反复冲击，才答应谈判。我们派了代表，我作为代表之一，拿着请愿书到省政府主席办公室见到了邵力子，进行了面对面的谈判。我们要求邵力子向群众公开答复。邵被迫无奈，出来向学生讲话，他避而不谈我们的请愿要求，大谈救国不忘读书。而我们则针锋相对，大谈读书不忘救国。他甚至公然挑拨东北和西安学生之间的关系。说什么不要被人利用云云。当我们揭发国民党军警枪杀东北竞存一小学生时，全场愤怒高呼：“严惩开枪军警！”。邵力子见势不妙，拂袖而去。游行队伍按原定计划向杨虎城“绥靖公署”进发。杨虎城将军派一位参谋长接见讲话，态度较好，将请愿书留下，答应转呈杨主任。大约已经下午三时，同学们奔波了一天，忍饥挨冻，但精神振奋，斗志益坚。大家都感到请愿的目的未能达到，没有见到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尤其是邵力子的答复，更是不能令人满意。

这时队伍中有人振臂高呼：“到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全场热烈响应，掌声雷动，纷纷表示赞同徒步到临潼见蒋介石。对此，我们没有料到，毫无思想准备。当即向党组织请示，决定支持群众的要求，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让我们带领群众赴临潼请愿。鉴于小学生体力不支，动员他们不要参加。

这时西安各界代表前来慰问，群众情绪更为高涨。我们调正了请愿队伍，以防不测，以东大工学院学生为前导，西安高中学生殿后，大队立即奔赴东门，呼哨出城。我们看到游行队伍两侧由东北军，西北军沿途布防，名为监视，实为保护。队伍浩浩荡荡进抵坝桥附近。大约下午四时，突然，张学良将军带领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乘车从后赶来。他站在公路旁的土岗上向大家喊话，要求队伍停止前进。我们东大同学看到张校长来到，挥动校旗，怀着国破家亡之痛，颠沛流离之苦，满腔激愤，不断地高呼：“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停止内战，全面抗战”等口号。同学们声泪俱下，悲愤激烈、全场沸腾，久久不能平息。东北军开明将领王以哲将军等挥泪招手，泣不成声。张学良校长也十分激动，他劝告学生不要前进，他说：“现在天色已晚，再往前走未必是坦途。东北是我丢的（原话如此）我要收复，以谢国人。张氏荣华富贵已成过去，个人生命财产已置诸度外。请允许我代表你们，将你们的请愿书递呈蒋委员长。我说话算数，三天内一定答复”。张学良将军的诚肯态度，肺腑之言，受到学生的欢迎，于是队伍拉回西安。事后得知，当时蒋介石已在临潼布置了大批军警宪特，准备血腥镇压请愿队伍。西安学生这次行动由于张学良将军的劝阻，避免了一次流血事件，促进了“双十二”事变的进程。

十二日清晨，枪炮之声大作。不久传来消息：张、杨二将军实行兵谏，将蒋介石扣压。震撼世界的“双十二”事变爆发了。同学闻讯人心振奋，欢喜雀跃，都说张学良将军言而有信，以实际行动答复了学生的请愿要求。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投入战斗。东大学生会得到学校当局的大力支持，纷纷参加各种救亡活动。东大学生会和东北民众救亡总会联合组织了“关中东路宣传队”赴渭南、临潼、华县等地，向东北驻军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我们到驻地向每一个团建制的士兵讲话，鼓舞士气，宣讲张、杨“八大主张”。“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

汪，”感到格外亲切。士兵们说：你们是东北的大学生，我们相信你们。

民先争取了公开合法活动。民先队部组织东大和西安各校民先队员三百余人，组成了民先“关中西路宣传队”。由民先队长刘金声带队，先后到兴平，武功，岐山，扶风一带，深入农村，利用话剧、活报剧歌咏、讲演等形式向民众宣传张、杨“八大主张”抗日救国道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部队进驻西安。东北大学工学院学生仍继续斗争。一九三七年二月，东北反动政客臧启芳乘火打劫，前来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声称受国民党教育部之命，前来接收东大。西安东大学生受到“一·二九”“双十二”两次战斗洗礼。对国民党反动派已深恶痛绝，决不让臧启芳之辈阴谋得逞。我们认为东大是地方办的大学，国民党政府无权接收。而臧启芳臭名昭著，更是不受欢迎的人。经学生会研究后，并征得同学们支持，大家决定护校。臧启芳闻讯竟派部队把学校围起来，校门口架起机关枪，向学生们威胁。学生会公推李正风，胡景和、伊文家、王天任，查庆丰等六名代表和臧谈判。我们提出：“东大校长是张学良，你要接收去找张学良交涉（张学良将军送蒋已被扣留南京）。没有张学良的同意，我们不承认你是校长。东北大学是文化重地，不能派武装进驻。学生都是东北子弟，如发生不幸事件，你要负完全责任，你将何颜以对东北父老？”谈判十分激烈，直至深夜。最后我们再三警告：“如果硬是接收，你只能接收个空空校舍。”第二天我们返校和同学们商量，认为当前形势非常不利。臧启芳背信弃义，国民党部队并未撤离，只把机关枪收起。少数反动学生在校内到处挑衅，寻找借口，挑起武装镇压。大家认为护校不成只有迁校。于是我们学生会研究行动方案，作到有组织，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迁校准备。首先将贵重仪器装箱待运。臧启芳眼睁睁看到学校迁走并不甘心，他

通知西安铁路局不卖给东大学生团体票。他以为我们都是穷学生，无钱购买单人车票，企图以此卡住我们，回不去北平。经过研究，我找到“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先生，说明我校当前的处境和准备迁校的打算。吴先生表示同情，给予大力支持和充分信任。第二天，我到吴公馆取来数千元现款，足够同学车费之用。臧启芳的这一招又失败了。于是我们分三批返平。第一批当列车行至潼关时，臧指使国民党宪兵上车搜查，将我们携带的仪器全部扣留。当我最后离开西安时，工学院只剩下十八名国民党学生，冷冷清清守着空房臧启芳为此恼羞成怒，竟挂牌开除我们六名学生代表，这不过一纸空文而已。

在我们护校迁校过程中，虽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但得到了西安高中、二中、师范学院等师生冒险的援助和有力的支持。我行前，代表东大向西安战友辞行并表示感谢。我们返平后，受到北平东大同学热烈欢迎。西安、北平两个东北大学又胜利会师了。从此，东大学运又有了新的内容，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

作为这篇回忆录的结尾，我向当年并肩战斗的西安同学表示深深地怀念和衷心的敬意，借此寄语：“西安战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法库县委在陶铸关怀下的三年

于 之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从晋西北根据地来到东北沈阳，被分配到辽北一地委所属的法库县任县委书记。当时，辽北省委书记是陶铸同志。同年十二月，陶铸同志和省委从沈阳撤到法库县城。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法库县委一直在陶铸同志的领导下，坚持在敌后斗争，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沈阳解放。在这三年艰苦的战斗生活中，陶铸同志热情奔放，襟怀坦荡，知识渊博，多谋善断，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杰出政治家，勇于拼搏，开创新局面的优秀领导者。

(一)

我们法库县委的“一班人”，是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由东北局组织部在沈阳组建起来的。我任县委书记，张维华同志任县长，韩立中同志任组织部长，刘卓仁同志任公安局长，李永才同志任县大队长。县委这些成员，除李永才同志是一位长征老干部，其余的几位同志分别来自延安、晋绥和晋察冀等根据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省委、地委机关都由沈阳撤到法库县城。随之又带来一批从延安革命圣地来的老干部，其中有给陶铸同志当秘书的薛光军同志，给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当秘书的华子扬同志，还有王丹波和徐羽等同志。这些同志的水平都比较高，他们到法库县后，本应都留在县里工作。可是，身为省委书记的陶铸同志以党的事业为重，从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出发，针对每位同志的长处，做到知人善任，有所做

为，只留王丹波同志任县公安局局长，其余的同志都分配到区里去工作。薛光军同志任四区区委书记，华子扬同志任四区区长。不久，组织上又决定我随杨易辰同志到二地委接受分配，由薛光军同志接替我任县委书记。做这样安排是比较适合的。然而，韩立中、刘卓仁等几位同志则认为，法库地处沈阳外围，处于敌我拉锯状态，战斗甚为频繁，几乎天天不断。为适应斗争环境的需要，他们建议把我留下，主动到陶铸同志的住处，当面向陶铸同志陈述其看法和建议。陶铸同志仔细听了之后，当即欣然采纳，改变了原来的决定，留我继续任法库县委书记，薛光军同志改任县委副书记。我们法库县委同志团结奋斗，没有辜负省委和陶铸同志的关怀、期望和信任。在整整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我一直在法库坚持战斗。法库对敌斗争结束后，又调我到铁岭县任县委书记。铁岭解放后，陶铸到沈阳，又把我调进沈阳工作。

(二)

陶铸同志同省委到法库后，遵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法库地区的实际情况，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收缴地主联庄武器，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他指出：

“在运动中要注意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充实政权及人民武装力量。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发展人民武装力量，收缴地主联庄武器。眼下的联庄基本上是豪绅地主的武装，必须打乱和取消。地主不能把持武装。不然，就是地主的根据地。”由于有陶铸同志的正确直接领导，又有当时驻在法库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野战军几个师和省委、省政府、辽北军区以及地委、专署作坚强后盾，法库县建立革命根据地等各项重要工作，都开展得很迅速。我们在法库城南，先打倒了号称“南霸天”的陈化南；接着又在城北分了桃儿山老孟家（地主财阀）；在城内处决了山岸（日本人）和罪大恶极的

大汉奸、大恶霸等人。从而，人心大快，群情沸腾。由于发动了群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收缴了地主联庄的各种枪械近两千支。其中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五挺。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得到壮大。法库县的各个区都组建起区保安大队，各区大队的领导骨干配备得比较强。第三、四、五、六区的区大队长，都由着军区司令部派出的来自关内有战斗经验的团营级干部担任。各区大队的政治委员，均由区委书记兼任。各区大队的战斗力也都挺强，在武器装备上，都配有机枪。县里建立了保安团。由于全县人民武装力量壮大的比较快，仅在一九四六年的几个月当中，就给省里输送了一个警卫连，给主力部队补充了四个连队和一个县保安团的兵力。尽管这样，县里仍保持有四个连建制的县大队。到一九四七年，法库县武装力量又有较大发展。通过配合野战军二纵队打扫歼灭敌新五军的公主屯战场，配合野战军七纵队攻打彰武和大孤家子等敌人，并通过各种途径和办法，搞到各种类型机枪二十多挺，六〇炮、火箭筒、掷弹筒等十多只，进一步强化了法库县区两级武装的装备。在政权建设方面，各区都配备了坚强的领导骨干。各区的老干部，一般都有四、五人，多者达六、七人。村政权也相应地普遍建立起来。

(三)

一九四六年一月，我们党决定，要通过人民议会为主要形式的各种合法斗争，同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地区争夺政权。我们法库县实行了参议会制，它是在全东北地区最先搞起来的第一个县参议会。它是在陶铸同志直接领导下筹备组建的。当时驻在法库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省委和省政府、地委和专署等领导机关都派代表参加。在筹备期间，李富春、吕正操和郭峰等领导同志路过法库。李富春同志在法库停留期间，为帮助我们开好县参议会，还帮助我们起草了十大施政纲领。这次县参

议会，开得很成功，通过了施政纲领，选举我为县参议长，韩立中为县长。经过这次会议，广泛宣传了党的政治主张，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在法库地区初步形成了党的民主统一战线。与会的法库县上层人物、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一致认为，共产党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提出的政治主张合民心，顺民意，讲出了人民群众的所想和所盼，一定能够治理好法库县，一定能够治理好我们的国家。会议期间，王兴让同志在会上做了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他讲的深入浅出，生动感人，振奋人心，受到与会者的称赞。胜利报社社长许立群同志负责县参议会秘书工作。他很能干，整理的提案和处理意见，既迅速又准确，合情合理，符合实际，人人都佩服。与会的各方面人士，通过亲耳听取会议各项议题的精辟报告，亲眼看到会议人员高效率、高质量的工作，都称赞共产党有人才。他们说：共产党真有人才，优秀人物都集中在共产党这一边了，焉能不得天下！

（四）

一九四六年五月，正当我们在放手发动群众，抓紧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发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五四土改指示》。陶铸同志当即敏锐地认识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这一重要指示，是建立好革命根据地的最关键一环。省委当即决定在康平全县进行土改试点。陶铸同志要求我们要尽快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县委雷厉风行，于五月六日，学习讨论了中央指示和省委部署，研究制定了贯彻执行方案，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分工。县委副书记薛光军到一区和二区；我到三区 and 四区；县委组织部长刘卓仁到五区和六区。他在六区传达后，去五区时遇敌进攻，壮烈牺牲。尽管这几个区在当时属敌我拉锯区，但经过我们做艰苦深入地发动群众工作，凡是能够开展的地方，均开展了土改斗争。就是敌军于六月八日侵占了法库县城之后，陶铸同志仍指示我们不要放弃农

村的土改斗争。六月底，敌军又分别在二区的杨家沟，三区的大孤家子，四区的三面船，设立了据点。其中，盘踞在杨家沟、三面船这两个据点的敌军，在我们县大队和军分区部队的攻击下，很快就撤退了。到八月中旬，设在三区大孤家子的敌据点，也被我军分区和省军区部队一举攻克，歼敌二百余人。由于敌据点一一被我军攻克，群众斗志不断高涨。我们县委便乘群众斗志高昂之际，进一步抓紧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土改运动，扩大土改斗争成果。当时，除了分布在法库县城周围的一区各村没有搞土改运动之外，其余各区都有相当一批农村开展了土改斗争，三区和四区分过地的村子有三十多个，全县有四分之一的农村都分了地。

（五）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军赢得秀水河子歼灭战的重大胜利。这是我军在东北战区第一次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歼灭以美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主力军队的重大胜利。这次歼灭战胜利之后，陶铸同志主持在法库县城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并展出了缴获的美式大炮、美造大汽车等一大批战利品，对法库县和东北人民以极大鼓舞。这次歼灭战，由于当时我军主力部队武器装备很落后，虽然赢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伤亡比较大。据此，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如果敌军主力再来进犯，我们就实行战略转移，以利积蓄力量，组织强有力地反击。不久，敌主力部队由新民公主屯向法库方向进犯。在这种形势下，我军主力及领导机关便往法库以北转移，只留陶铸同志率省军区的保安一旅在法库县城坚持。我们县委和县政府也在县城内留守。当敌先头部队于深夜十一时进犯到距县城十二里的四台子村的时候，陶铸同志仍临危不惧。他一面令我们县委、县政府转移到法库城东北的四家子一带活动待命，一面亲自率保一旅撤到县城外围，继续观察掌握敌情动态。翌日

拂晓，陶铸同志得知敌军由于深怕再遭到秀水河子战役那样的惨败，因而当其大部队窜到了家房，先头部队窜到四台子之后，就又连夜龟缩回新民境内。于是，陶铸同志当机立断，又率保一旅的一个团进城，同时派骑兵通知我们火速回县城开展工作。陶铸同志率部队返回法库西城边时，遇到当地地主豪绅成群结伙打着小旗欢迎所谓“国军”，以及他们相互咒骂共产党的可卑场面。陶铸同志当即予以训斥，并把这些地主豪绅带到城内，交给我们处理。我们给予教育后，放其回家。

(六)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初，我们辽北一地委几个县（缺康平）大约二百五十名县、区、村干部，曾一度撤离铁法地区，经哈尔滨，转移到西满分局所在地的齐齐哈尔市。我们到达齐齐哈尔后，西满分局负责人黄克诚同志接见了孙良才和我。黄克诚同志在接见时说：“你们在敌后那种情况下转移出来是对的。保存了干部，保存了部队，没有受到损失，就是胜利。”他还讲，要把我们这些干部都就地分配到龙江、北安等省工作。并强调指出：行动要快。因当时形势很紧，我们也准备从哈尔滨转移。接见后，在嫩江饭店，向一些县委负责人传达了西满分局的指示意见。讨论时，大家意见不一致。有部分同志主张听从西满分局的意见，接受就地分配就算了。而孙良才、薛光军和我，则主张打回辽北去，回原地区坚持斗争。我们所以提出这样主张，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这次撤出，未经组织批准，尽管大家在撤出之前，都曾在撤出的决定上签名盖章，以示共同负责，但总觉得心里有愧似的。虽然西满分局已经明确表态了，但还不知地委和省委是何态度，所以总是不放心。尤其孙良才同志，他是地委委员，是牵头的，更是放心不下。正在大家犹豫不定之际，得知省委和陶铸同志都在白城子，便决定让我立即去白城子，直接向陶铸同志汇报请示。我赶到白城子，

天时已晚。陶政委见到我很高兴。他关切地说，很长时间不知道你们的消息。他听了我的汇报之后，立即带我乘车，连夜到齐齐哈尔，与西满分局协商。陶铸同志见到大家，不仅毫无责备之意，反而表示出对我们深切关怀和亲热慰问之情。他见面就说，我是来接你们回家的。大家听了，都心里热乎乎的，不少同志被感动得落了泪。因为我们这次撤出，未经组织批准，所有我们这些县委负责同志原都准备接受处分的。听陶铸同志这么一说，大家都一块石头落地了，顿时振奋起来。西满分局接受了陶铸同志的意见，只留下少数身体不好的同志就地分配，其余的大多数同志都随陶铸同志到白城子辽北省委。

(七)

一九四七年春节前，陶铸同志在白城子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干部会议，专门就如何坚持开展敌后斗争的问题，开展大讨论大总结。撤到白城子的辽北一地委所属的县、区、村干部，以及昌图、昌北和新民等县的干部，孙良才、于之、薛光军、郭吼、王丹波、李涛、白洁、肖岗等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省委秘书长郭峰、地委书记傅雨田，组织部长曾志等同志也都参加了会议。在会上，陶铸同志精确地分析了敌后斗争形势。他说：“就东北地区整个战局来说是敌强我弱，但在敌后，有时是我强敌弱。敌占城市和交通线兵力分散，敌占区的一些县城有时没有主力，只有一些地方团队，我们军分区部队完全可以对付。敌后的广大群众经过切身体会，已看清了国民党的面目，尝到了苦头，一扫盲目正统观念。广大贫下中农由于我们开展反奸清算运动，贯彻五四上改指示，对我们党是殷切盼望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听了陶铸同志的报告，与会干部对开展好敌后斗争的信心，决心和士气大振。整个会议，进行了四、五天。在会议期间，陶铸同志不仅一再引导大家联系敌后斗争的实践，广开言路，畅

抒己见，还单独找一部分县领导干部进行座谈，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陶铸同志在集中大家意见、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最后制定了斗争的策略：以军分区主力部队为核心，组成强大武工队，根据不同情况，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集中分散，分散集中，集中战斗前进，分散做群众工作。分区司令员赵东环、地委书记刘瑞森总负责，各县统一组成支队，专员宋广常担任支队长，孙良才任副支队长。各县分别组成武工队。我们法库县因原县大队已被辽东编走，只好由各区撤出的人员，组建成拥有三十人的县大队，以打通路甘旗卡以西地区为依托，如遇敌大规模进犯，我们便集中起来到这一带休整，以待机再大踏步前进。在总结大会结束后，部队出发之前，陶铸同志又主持召开一次誓师大会，还让我上了主席台（台上共四人）。当时，有少数同志存在“重城轻乡，好北恶南，趋汉避蒙，走东厌西”等错误思想以及怕艰苦、怕牺牲等消极情绪。在誓师大会上，陶铸同志做了鼓舞人心的动员报告，并严肃地批判了不利于开展敌后斗争的各种错误思想情绪。他还在会上宣布，白城子也准备撤出，省委将要分成前方和后方两条战线。他到前方第一线，指挥战斗，开辟地区。这次大会，使大家深受鼓舞，士气倍增。我们法库县大队出发前，陶铸同志对我们如何开创敌后斗争新局面，提出了明确的方针、任务，指出了步骤、方法，还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考虑到我们县大队是新组建的，装备很差，没有机枪，陶铸同志让我带着他的亲笔信，到边区找野战军四师求援，四师支援我们两挺机枪。当时省财政很困难，也拨给我们县委三十万元做活动经费。一九四七年春节一过，我们就开赴敌后。斗争实践证明，陶铸同志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根据陶铸同志的部署，我们一地委这支武工队，远距离地插入敌后，先奔袭康平，解放了康平县城，再攻打法库，又解放了法库县城。之后，敌主力又大举反扑，我们便大踏步后撤。不久，我

们再一次插入，再次解放康平，并站住了脚。

(八)

陶铸同志对人民的事业极为热忱，对人民的感情热烈如炽。他善于发现人才，大胆重用人才。他对干部要求很严，但严中有爱，爱而不俗。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感受很深。一九四六年一月，法库县召开首届参议会期间，王兴让同志在会上做了关于当前形势的讲演，使大部分与会者激动得都站了起来，一再称赞讲的好，讲出了同志们心中所想和所盼。在庆祝秀水河子歼灭战胜利的万人祝捷大会上，王兴让同志又做一次讲演。他的讲演，从一开头就把全场人都吸引住了。他讲，什么是和平，什么是民主？和平，就是不打仗了；民主，就是老百姓当家做主说了算。人们仔细倾听，全场鸦雀无声。这既反映了东北人民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十四年奴役，极其渴望天下太平，也说明王兴让同志确有宣传鼓动才能。通过这两次大会，陶铸同志发现王兴让同志富有宣传鼓动的特长。根据当时东北人民对我们党缺乏了解，存有盲目正统观念，便当机立断，给王兴让配备一台专车，让他轮流到康平、铁岭等几个县去宣讲目前形势和我党的任务，收到了很好效果。

陶铸同志一贯关心别人胜于关心自己。在白城子结束整训，开赴敌后之前，他把我们法库县委的几个同志找去，他把在延安时一位美国朋友送给他的一大瓶消炎片拿出一部分交给我们。这种药，当时在国内没有，在国外也是新产品，对伤员很有用处。他让我们每人分十来片，并教我们怎样用。有一次，陶铸同志到前线巡察，发现身患肺病的地委书记傅雨田的被子单薄，便立即把自己用的一条俄国毯子送给傅雨田同志。一九四六年底陶铸同志患肺病，为了给其治疗，我们法库县委通过关系，到敌占区沈阳用重金换购十瓶外国新产的治肺病新药。我们派人给他送去，尽管他十分需要这种药，然而，他自